

繼承、創建與深化——

劉翔*

二〇〇八至二〇一七大陸隋唐佛學研究述評（一）

摘要

二〇〇八年至二〇一七大陸隋唐佛學研究，一方面延續傳統，圍繞教義、教史、教派、人物等問題進行深入和廣泛的研究，佛教史學成績卓然；另一方面，有學者創新研究方法和理論視角，在綜合前人研究基礎上或提出新觀念、或論證更全面、或建立新體系，形成具有典範意義的成果；而一大批學者的專題性探討，深化了隋唐佛學相關問題的研究。同時，文化交流和出版的繁榮，成為佛學研究的有利外緣，促進了學界和教界、大陸與港臺以及海外的學術互動。

關鍵字：隋唐佛學、佛教史、理論建構、創新

隋唐佛學是中國哲學與思想第一次成功吸收和轉化外來思想的典型代表，成為中國文化和思想史上重要組成部分。在融合和創新基礎上，中國化宗派成立、傳播和發展，其理論和實踐對中國人精神和生活世界產生深刻而廣泛的影響，值得學界重視並深入研究。¹

二〇〇八年至二〇一七大陸隋唐佛學研究，佛教史、禪宗、天臺宗和唯識宗是熱點，律宗和淨土宗相對較少；多採取文獻學、考據學、思想史、哲學等方法，宗教學、社會學、人類學等方法也逐漸盛行。此外，綜合性研究得到提倡，通過多學科、多方位、多形式的綜合，避免對佛學的片面理解，還原立體的、豐富的佛教與佛學。一些著作深入了對若干問題的研究，拓展了視域，開闊了視角，其中突出的成果使得隋唐佛學研究取得不可忽視的成績和進步。

我們從三個方面介紹這一時期的研究：一、作為研究基礎的佛學史、佛教史和思想史成果；二、有創建性的佛學理論體系；三、以佛學問題為中心的論著。三個方面內容上涉及隋唐佛教思想和文化的各個領域，方法上有繼承傳統的，有自成一家的，多元共存，各有其美。另外，文化交流和學術活動的繁榮，學術著作的出版便利，以及大量海外和港臺著作的引進，都起到一定促進作用。

一、大量佛教通史、專題史和哲學史 成果為隋唐佛學研究奠定了堅實 的史學基礎。

中國佛教史研究，從學習日本始，經湯用彤開拓，後有呂澂在佛學思想方面的貢獻，至任繼愈主編三卷本暫止，幾輩學人接力付出，以一部十五卷的《中國佛教通史》畫上圓滿句號。²《通史》自佛教初傳迄於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涵蓋中國佛教的典籍、人物、教義、制度、經濟、文化藝術乃至三教關係、對外交流等方方面面，是第一部完整的中國佛教史。在遵循「史實為本」的基礎上，教與理相容、史與論並重，凡學術界的共識，採取學界「定論」，對於尚有爭議的問題，則根據研究直抒己見。此著有「學術版」之稱，對中國佛教史研究有重要貢獻。

《通史》卷五到卷八，對隋唐各宗派的思想、人物有詳實的介紹和深入的分析，還從佛教政策、儒釋道三教關係、僧官制度、寺院經濟、佛典翻譯、生活信仰等方面展開論述，多視角、多層面的再現隋唐佛學的歷史背景和整體風貌。作者認為，隋、唐是中國佛教的鼎盛期，也是中國佛教的成熟期，這時期佛教諸宗派，大多

另闢蹊徑，自造家風，以「六經注我」的精神，「說己心中所行法門」。

具體說來，天臺宗以「性具善惡」的佛學理論和「止觀並重」的修行方法，一改佛教傳統說法和南義北禪的分裂局面，建立了第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宗派；其五時八教說更是別處心裁，自成系統，不拘泥經教，以自家的理解，對釋迦一代說法進行重新編排，使得有人責備它改變了印度佛教的本來面目。華嚴宗雜糅百家、兼收並蓄，以「圓融無礙」的理論，調和中土佛教史上「衆生有性」論與「一分無性」說的尖銳對立，使它們各得其所；根據《大乘起信論》的「心造諸如來」和「一心二門」的思想，改變了《華嚴經》以「法性清淨」為基礎說一切衆生乃至諸法的平等無礙，使中土佛教的唯心傾向更加明顯，為以心為宗本之禪宗的發展鋪平了道路。而作為中國佛教代表的禪宗，更遠承佛陀的本懷，面對現實人生且直探心海，由超佛之祖師而越祖之分燈禪，對佛教之傳統和傳統之佛教進行了革命性的變革。這些極有見地的總結，使我們認識和理解隋唐佛學的精神有著醍醐之感。

長期以來，大陸學術界對中國佛教處於世界佛教的地位和影響，佛教在世界各個民族、地區的傳播和發展

、特徵和差異，缺乏相關研究。不過，魏道儒主編《世界佛教通史》，填補了這一學術空白。³十四卷、八百多萬字的《世界佛教通史》對佛教創始到二十世紀在全世界傳播歷史，以歷史學和哲學方法為主導，整合宗教學、文獻學、考古學、文化傳播學等方法，作出貫通性、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並側重考察佛教的和平傳播、佛教的本土化、佛教教義體系與禮儀制度和文化藝術的關係、中國佛教在世界佛教中的地位四個方面問題。

此著第四卷（西元七世紀至十世紀）是隋唐佛教的論述。作者總結到，隋唐佛教宗派形成是南北朝以來佛教發展的必然結果，從不同方面對南北朝佛教在理論和實踐上的繼承和發展；隋唐時期寬鬆的政治、發達的經濟、繁榮的文化、暢通的國內外交流，為宗派成長提供了絕佳的外部環境，也使佛教的內外交流繁盛。而政治態度、理論創造、基地建設和組織系統則是各個宗派的共性。

作者指出，禪宗作為最適合中國社會的佛教形態，尤為值得關注，這是佛教成功實現歷史性轉型的案例。以《壇經》出現為標誌，惠能完善了禪宗的基本理論，長期影響禪宗理論和實踐的發展進程，也影響了整個中國佛教的理論和實踐走向。另一方面，安史之亂之後，

義學諸派的衰落，傳統意義佛教哲學發展走向終結，禪宗逐漸興旺成為主流，是與其適應社會而具有強大生命力密切相關的。至於此後的禪學發展，是禪宗實現轉型的具體過程，也是中國佛教轉型的具體過程，禪宗的發展基本上等同於中國佛教的發展。被禪宗塑造和變革的中國佛教，具有中國特點的精神氣質和基本面貌。

除此之外，其他通史、專題史與哲學史，不同角度和視域的補充，使中國佛教思想和哲學的研究具有全面的歷史學基礎。季羨林、湯一介主編《中華佛教史》著眼從整體中華文化的角度對佛教的研究，有著自身特點。孫昌武《中國佛教文化史》探討佛教與諸多文化領域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得到發展、取得成果的歷史。楊曾文《隋唐佛教史》是目前最新的隋唐佛教通史著作。⁴本書從社會歷史、宗教政策和制度、宗派思想與人物、佛經翻譯與研究以及佛道爭論、佛教與政治等方面對隋唐佛教做了詳細介紹。從歷史梳理到思想分析，從修行實踐到社會影響，張總《中國三階教史：一個佛教史上湮滅的教派》對三階教做了整體而深入的研究，填補三階教研究空白。聖凱《中國佛教信仰與生活史》從社會史、制度史、文化史三個方面研究佛教中國化，其仲介紹了隋唐五代佛教徒的信仰與生活。戴瑩瑩《隋唐

五代正史佛教史料輯稿》提供了正史資料的查詢便利。葛兆光主編《佛教史的研究方法與前景》是學術討論和研究綜述的結集，對於佛教史研究有一定啓發。

（未完待續）

註釋：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博士生；通信地址：上海市

閔行區東川路五〇〇號（二〇〇二四一）

樹葬在台中市逐漸得到民眾認同

根據台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統計，從二〇一一年至二〇一六年，台中市每年樹葬人數從二百五十三人增到八百四十人。又以去年為例，全年火化人數為二萬餘人，樹葬八百四十人，樹葬比例達百分之四。隨著觀念改變，標榜回歸塵土、環保的樹葬愈來愈被接受。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指出，自十一年前在北屯大坑設置台中市首個樹葬區，規畫一千五百多個位置，民國一〇四年四月全部額滿。大坑追思園有一千五百三十六處植穴，目前都在使用中，神岡崇樸園有三千一百一十六多個植穴，目前也已使用了近五成。據統計，平均每每月約有

1. 十年間相關學術著作較多，除非必要，著作出版資訊省略，且為敘述之便，對前賢名家也略去尊稱。

2. 賴永海主編：《中國佛教通史》，江蘇人民出版社，二〇一〇年。

3. 魏道儒主編：《世界佛教通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二〇一五。

4. 楊曾文：《隋唐佛教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二〇一四。

七十人申請，增加樹葬區刻不容緩。台中市府日前在大雅區開闢第三個樹葬區，規畫一萬個位置，動土後預計明年三月完工。大雅區是利用大雅生命藝術館旁的一萬八千多平方公尺土地，規畫第三個環保自然樹葬區，共分五處樹葬區，可設置一萬個樹葬穴位，未來將分區輪流開放民眾樹葬，永續利用。

生管處長陳志銘說，樹葬推廣已有十多年，樹葬園區不立碑、不燒香祭拜，園區彷彿一座大公園，加上環保生態的特質，近年來讓更多人選擇長眠在大樹、綠地之下。有家屬認為，樹葬區比納骨塔或墓園，環境比較像公園，追思親人時比較自在，勉懷先人的同時也感受到自然生機。